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涂江波,程晓雪.论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协调性特征[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6): 119-124.

# 论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协调性特征

涂江波 程晓雪

(长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邓小平理论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而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显著的协调性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生产发展与环境治理相协调、资源节约与开发利用相协调、人口规模与资源容量相协调、国内法制与国际公约相协调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其协调性特征,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联系,也对解决当代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协调性

**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6-0119-06

生态文明是一个包含了生态物质文明、生态精神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的综合性概念,是人类为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社会发展,由这三个方面构成的总体性文明。生态文明不仅是对工业文明主导的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对今后可持续发展方式的一种美好憧憬。邓小平生前尽管并没有正式使用过“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他更多使用的是“生态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建设”等概念),也没有集中论述、系统阐发其生态文明思想,但是,从他的一系列著作、谈话和实践活动中都能看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并注意了其生态文明思想的协调性特征。这一特征具体体现在主张生产发展与环境治理相协调、资源节约与开发利用相协调、人口规模与资源容量相协调、国内法制与国际公约相协调等四个方面。

## 一、生产发展与环境治理相协调

邓小平在引领我们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时,对环境保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指出,生态保护

必须从源头做起,只有从根本上降低物质生产对环境的破坏,才能真正触及生态问题的关键。他主张“生产发展”和“环境治理”要相互协调,有机统一。这是其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为落实这一要求,除了将环境保护、植树造林列为基本国策外,具体措施上也强调要及时治理由生产活动引起的环境污染。

上个世纪后半叶,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历程中,曾经由于过度追求数量增长而产生了许多环境污染问题。邓小平对这些在建设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采取了严厉的批评和警示态度。他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是互相影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能为了发展经济来打破生态环境的平衡,要以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来处理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长远看,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促进生产,也可以有效保证生产的持续。因此,邓小平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要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由生产活动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要及时治理。“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

收稿日期:2024-05-21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前期资助项目“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研究”(22ZD217)

第一作者简介:涂江波(1982-),男,江西丰城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通信作者:程晓雪(2000-),女,河北魏县人,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2388586269@qq.com。

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sup>[1](P363)</sup>1973 年 10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陪同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夫妇一行到广西桂林访问。期间,邓小平注意到,桂林部分企业排出的烟雾和废水,已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漓江的水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他特地把当地官员召集起来,和他们一起剖析污染产生的原因,并且寻找解决的对策。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sup>[2](P589)</sup>同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赴河北邯郸考察,途经峰峰矿区的彭城车站时,发现一座水泥厂冒出的黑烟对当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除此之外,1978 年 9 月,邓小平在视察唐山时提出了对“三废”的循环使用,并建议相关企业在处理工业“三废”的问题上,可以采用回收利用的方法,以此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由此种种可以看出,邓小平十分注重环保和防治污染,反对以破坏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发展,主张发展生产和治理环境相协调,形成良性循环,亦即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其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邓小平就怎样更好地、更有效地开展环保工作做出了多次批示。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党中央和国务院将环保列入国家发展战略。1983 年 12 月 31 日,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环境保护被正式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也成为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为了创造一个更加宜居的环境,让未来世代得以享受到持续生存与发展的资源,推动社会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国家鼓励人们采取行动,在减少对环境造成不必要损害的行为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环境保护工作。

在落实环境保护这项基本国策,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环境保护方面,最直观的举措就是覆盖全国全社会的植树造林运动。早在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植树造林,通过绿化来改善生态环境。新中国成立后,他十分重视国家的绿色发展事业,提倡要植树造林,要科学发展林业,还要把造林作为生态保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此达到让祖国的山河变绿,达到防风固沙、防灾减灾、保持水

土、调节气候的目的。“文革”结束之时,整个国家百废待兴,诸多问题亟需解决,但邓小平却高瞻远瞩地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他的很多讲话都谈到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1981 年夏天,四川遭受严重洪涝灾害,9 月,邓小平与时任分管四川省林业工作的万里副省长谈到此事时,提出洪涝灾害与滥砍滥伐、林业问题密切相关。基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植树造林,一人一年栽三五棵树,对有功的有赏,无功者有罚,营造一种全民绿化的良好氛围。他提出可以针对植树造林出台相关文件并使之法律化的建议。在他的亲自推动下,1981 年 12 月 13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为更好地实现国家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议》将植树造林、美化大地正式确立为每一位中国公民的职责和义务。邓小平不仅倡导人们植树造林,更身体力行,几乎每年都参与植树活动。1979 年至 1989 年,他连续十一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起到了很好的表率 and 示范作用。最后,值得强调的是,邓小平在有组织地“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方面做出的一次重大部署。1978 年 11 月,针对我国北方地区严重的土壤侵蚀、风沙灾害,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设“三北”防护林的重要战略构想。这是国家生态建设的一项里程碑工程,也是国家减轻自然灾害,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邓小平十分关心“三北”防护林建设,多次就此做出重要指示、批示。1988 年 5 月 11 日,他为已初见成效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亲笔题词:“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实施不仅功在当代,也利在千秋,使得我国森林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北方生态环境,是实现生产发展与环境治理相协调的生动体现。同时,为了保证全民植树造林运动的实效,保证环境保护责任得到有效落实,邓小平还主张建立健全奖惩制度和责任追究机制。1982 年 12 月,邓小平给林业部的报告上做出批示,提出“为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sup>[3](P878)</sup>。1987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2 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调查清楚火灾原因之后,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因工作不力被免职,同时,国务院对参与灭火救援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表彰。采用这种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策略,更加有效地强化了政策的指引作用,推动了相关制度的严格落实。

## 二、资源节约与开发利用相协调

我国是一个能源大国,在资源总量方面居世界

前列,但是人均水平却低得多,怎样合理解决国家发展所面临的能源配置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资源节约、减少浪费与资源开发利用相协调的主张。

一方面,邓小平主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在资源节约的前提条件下进行。1954 年 1 月 13 日,邓小平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谈财政工作六条方针时提到:“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sup>[4](P197)</sup>他还提倡勤俭建国。在 1957 年 4 月 8 日《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只有勤俭建国才能将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家。他强调说:“因为你穷嘛!如果在贫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个国是建不好的。”<sup>[4](P263)</sup>1975 年 8 月,邓小平又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只有提高产品的质量才是最大的节约的理念;同时,他也针对能源资源浪费的现象,提出提高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的策略。邓小平把丰富的自然资源看作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大基石。他提出,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要有丰富的资源和国际上最先进的科技,综合这四个条件才有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我国的资源状况亦即物质基础情况,邓小平并未抱有盲目的乐观。1979 年 3 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他就富有远见地分析了我国在资源方面的国情,对我国在资源总量上是大国和在资源人均占有上是小国这一矛盾进行了阐述,为我国走资源节约型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倡建立在节约基础之上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在事关生态环境的资源开发与利用上,主要针对的是四种资源。一是对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邓小平指出,农业、工业和各项事业的建设都要以土地为基础,要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不要过分开垦,否则会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因此,他强调,开荒工作一定要认真,要从实际出发,全方位考虑。二是对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邓小平指出,由于中国山地众多,江河落差大,水力发电的开发和利用费用低廉,经济效益高,而且水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因此要大力发展水力资源,去替代煤炭这种不可再生资源。他指出,假如“火电上不去,要在水电上打主意。水电重大项目上去了,能顶事”<sup>[1](P17)</sup>。三是关于森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邓小平提出了“林木贮水”的观点。在他看来,洪水的爆发,主要是因

为“滥砍滥伐”,因此,要转变传统的砍伐方式,林区要把发展和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砍伐与种植尽可能地维持平衡,并且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特别是大面积的皆伐”<sup>[5](P457)</sup>。四是沼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1982 年 9 月,邓小平陪同时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到四川视察。在四川省双流县白家公社顺风大队参观农村沼气灶时,邓小平提出,沼气虽说简单,但却能解决乡村的大难题,“沼气得煮饭,还能发电”,“搞沼气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sup>[6](P97)</sup>,单单四川省每年就能为全国节省数百万吨煤。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要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他指出,我们国家是一个高能耗、高污染和高增长的国家,这给环保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以对资源、环境、公共卫生的持续透支为前提的,这样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既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又导致使用效益低下,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增加能源的利用效率。1978 年 9 月,在视察震后的唐山时,邓小平指出,可以对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对钢铁厂和矿井产生的热量,也可以进行循环利用;针对煤炭资源,他提出必须提高洗煤的比重,要利用坑口发电,以此提高煤的综合利用。他还以天然气为例说明,天然气可以用作多种化工原料,又可以用来发电。

总之,邓小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了资源节约和综合开发利用之间的相互协调。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才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坚定不移地走上一条以节约资源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这条道路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尊重和保护,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与追求,从而能确保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 三、人口规模与资源容量相协调

邓小平认为,应当正确对待人口规模与环境容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既不能盲目追求原有的静态平衡,更不能任意地对环境进行掠夺和破坏。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协调,需要通过控制人口与保护环境来实现。他从当时人口基数大、能源紧张、环境持续遭到破坏这一实际出发,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控制人口总量与人口的增长速度;二是强调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邓小平是党内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领导人。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情,他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使人口和资源、环境相协



调是一个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1953 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节制生育。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在人口基数大的现实情况下,人口会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产生较大矛盾。从资源总量来看,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但是,由于人口众多,我们的人均所有量却很低,“例如煤产量,1978 年,美国商品煤五亿九千九百多万吨,苏联原煤七亿二千四百万吨。我们去年的原煤也达到六亿三千多万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我们就少多了”<sup>[7](P259~260)</sup>。这份确切的数据反映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快速增长的人口必然会对生产性和消费性材料产生巨大的消耗。他深刻地意识到,全国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污染排放,已经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净化能力。基于这些认识,在 1979 年 2 月,邓小平对《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做出批示:“建议好好议一下,规定一些政策,以限制人口增长,看来是必要的。”<sup>[8](P488)</sup>他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考虑人口问题,把计划生育放在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将其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写入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的速度也相应变得缓慢了起来,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所调整,但不能用调整后的政策去否定当时所做出的决策。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计划生育政策是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订的一项方针政策,不但减轻了我们国家的经济负担,还减轻了亚洲的人口压力,推迟了世界人口承载能力达到上限的日期,它也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证。

对于如何处理好人口增长与资源容量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另外一个主张是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优生优育。邓小平认识到,实施改革开放之后,要推动中国的发展,不仅要减缓人口的增长,而且要改变当时较高程度的文盲率状况。邓小平对当时我国的这个弱点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主张要以教育为第一要务。他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sup>[1](P120)</sup>只有国民素质提升了,才能把人口优势转变为人才优势,各项政策才能更加顺利地实施,我国社会的发展才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因此,他在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即力主恢复高考。在 1978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提高教

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sup>[7](P103)</sup>1988 年 9 月,当他看到有关物价和薪酬改革的初步方案时,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sup>[1](P75)</sup>邓小平提出要加大对教育领域的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改善学校教学环境,对教育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确保资源都能发挥出最大效能,通过这些措施,来提高教育的整体质量和水平。此外,邓小平也十分注重环保教育,提出要通过宣传教育,普及生态知识,来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提高人们的环保责任感。在他的倡议下,1981 年在秦皇岛成立了中国环境干部管理学院,并将环保教育列为培养干部的重要课程。1990 年,在国家教委印发的《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中首次出现“环境教育”一词,环保教育开始在高中相关课程中渗透进行。通过将环境保护课程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干部培训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关注环境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全民的环保素质,进而推动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向前发展。

总之,在邓小平看来,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利用和改造资源环境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尤其是人口质量,是决定人类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协调的根本所在,人口增长过快,可能会导致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进而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如果控制了人口数量,对资源的需求会相应减少;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要不断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提升人口素质,使人们牢固树立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意识,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和利用自然资源,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积极寻求创新和环保的资源利用方法,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 四、国内法制与国际公约相协调

用制度建设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一种战略思想,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认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致性,必须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应建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体系,对影响生态环境的行为主体进行规范、约束和引导。

在推动法制建设,落实环境保护问题上,邓小平的首要主张是围绕生态立法,落实生态法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逐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引入了市场因素,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使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也使得保护生态

环境的方式方法发生了变化,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以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去做,那只能是事与愿违。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对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认识不足,而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邓小平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既要依靠经济、政治、科技等手段,也要依靠法律等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靠法制,靠法制靠得住些”<sup>[1](P379)</sup>。发展经济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进行,要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也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作为保证。早在 1961 年 7 月,邓小平考察黑龙江时就提出了依法保护森林的构想。他举例说道:“陈老总(陈毅)从日内瓦回来,说瑞士像一个花园,几百年来都有一个法律,砍一棵树要种活三棵,否则犯法。我们也应当立个法。”<sup>[9](P58)</sup>在其倡导下,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逐渐走上了法制化轨道,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为我国自然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完备的法律框架和坚实的法律依据。1973 年 2 月,邓小平重新恢复在国务院的工作,8 月 5 日至 20 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制订的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为中国的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相关法制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开了个好头。随后,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国家环保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这也是中国首次设立的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1978 年 3 月,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生态环境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为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哨音。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应该把重心放在加强法制建设上,其中就包括森林法、海洋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等,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sup>[7](P164)</sup>。此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走上了快车道,从 1979 年 9 月颁布新中国第一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后,《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相继颁布,初步形成了我国环境保护法制体系。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高度关注,也预示着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无

法可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推动法制建设,落实环境保护问题上,邓小平的另一个主张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入有关环境保护公约。我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承受着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离不开国际合作。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硬实力、软实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邓小平深知,环境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为世人所共有,一旦环境资源遭到破坏,就会引发波及全球的生态危机,没有人可以幸免,环境保护是各国不得不相互协调、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邓小平主张,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环保事业,整合国内外资源,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本着对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事务积极负责的态度,参加或者缔结了相关国际公约和条约三十几件,其中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签订的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等二十几件。另外,中国还积极支持了有关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许多重要文件,并把这些国际法文件的精神引入到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之中,使之相互协调。这些文件包括《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内罗毕宣言》《里约热内卢宣言》等。签署加入各种与环保有关的国际公约,是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承担大国责任的充分体现,也是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视野的充分体现。而在履行环境保护国际责任的同时,我国还大力维护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推进全球环境领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例如,中国与印度、巴西、南非组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四国”,并利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财政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总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国际上积极倡导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原则”等合作原则,有效地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

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领导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此期间形成的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经验的总结,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

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途中,系统梳理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其协调性特征,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联系,也对解决当代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刘建华,刘丽.邓小平纪事(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6.

[6]刘金田.邓小平视察中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刘金田,张爱茹.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 On the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eng Xiao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Tu Jiangbo Cheng Xiaoxue

(School of Marxism,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Deng Xiaoping Theory contains ric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s, and Deng Xiao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have significant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feature is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coordin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betwee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size and resource capacity,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domestic leg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Deng Xiao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grasping its coordinated characteristics i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us to grasp the profound connection between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but also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blem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Deng Xiao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Coordination